

朱东润自传



一八九六年我出生在江苏泰兴县一位失业店员的家庭，因此早年生活艰苦，所受的教育也存在着一定的波折。二十一岁我到梧州担任广西第二中学的外语教师。二十三岁调任南通师范学校教师，这一年结了婚，大家庭之外又加上一个小家庭，虽然那时物价便宜，但是这个双重的包袱，是够辛苦的了。在南通师范之初，曾经写过十篇左右讨论外语教学法的作品，

连续载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文杂志。这事我久已忘去了，前年葛传槩教授偶而和我谈到。当然这不算什么著作。

一九二九年四月间，我到武汉大学担任外语讲师。在那个学校里，低年级的外语讲师被轰走了四、五位，这才想起要到中等学校找一位资深的教师，我因为在中等学校很久，同时也不理解武大学生还有轰走教师这一手，因此就贸然去了。大约学生们因为轰教师的这套手法搞腻了，因此懒得再干，从此我就作为大学教师，直到今天。

但是中间还有一些变化。那时武汉大学的文学院院长是闻一多教授。他看到中文系的教师实在太复杂，总想来一些变动。用近年的说法，这叫做掺砂子。我的命运是作为砂子而到中文系开课的。

“东润先生”，一多说：“是不是可以到中文系开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课？”

我到大学教书是打的背水阵这一仗，退回中等学校当然谈不上，但是进也不容易。我是读过森茨伯里的英国文学批评史的，但是那时中国只出过陈钟凡教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，虽然筚路蓝缕，陈先生已经做出了最大的贡献，究竟只是尽了启蒙的责任，无法应用到大学的讲坛。因此我和一多说：“能不能给我一年的时间作一些准备工作？”

“可以可以，”一多说：“好在今年下半年还不开课，可以推到明年的秋天。”

这就是我的那本“《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》”的由来。这本书本来只称为“讲义”，后来叶圣陶提议交给开明书店出版的时候，他说：“讲义两个字的卖相不妥，还是不用为好。”可是我那本书算什么“史”呢？后来双方折衷称为“大纲”，一边顾到开明书店的卖相，一边也顾到我那不敢称“史”的虚衷。

在这本作品的写法方面，也考虑到那时武大中文系师生的特别要求。刘弘度教授有一句名言：“白话算什么文学！”好在“之乎者也”那套本领，我也领教过一些，因此这部大纲充满不少的文言调子。

一多还有一个想法，他想把国外人士讨论中国语言文学的作品，由英文介绍过来。这类作品我读过一些，由李约翰的翻译直到斯坦因的游记、高本汉的著述，但是苦于不能全面铺开。武汉大学的负责同志介绍我到上海和胡适谈一下。可是胡适也认为这方面的著述不多，没有办法，只能就体裁衣，勉强在武大开课，结果不够理想。

这时我在武大已经担任三个课了。一霎中文，一霎英文，实在有些吃不消，最后我向校中声请，无论中文或英文，我愿意担任一种语言文字，两门交叉，脑子转不过弯来。这才确定是中文系教师，而因为文学批评史讲稿的排印，也确定了教授的职称。

我认为中国文学作品的来源，主要出于《诗》三百篇和《楚辞》，因此我决心先从《诗》三百篇好好读起。我从关雎开始，把齐、鲁、韩、毛四家的诗说一一读过，而后再就《郑笺》、《孔疏》，以及宋儒和近代儒家的说法加以一番的比较。苏雪林听到以后，她说：“啊哟，那么哪一年可以读完呢！”不过我究竟还是读完了，当然，我的读书一向只是粗通大义，至于一般学者的章句之学，我没有这个本领，也没有这个兴趣。我的不能成为“学者”，大约是命中注定的！

在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当中，我写了一本《中国文学批评论集》；在读《诗经》的当中，我写了一本《读诗四论》。

这本《读诗四论》，是在抗战之初，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向香港转移之中出版的，因此销路不广，没有引起任何的谴责，不过其中是有一些非常可怪之论的。我认为诗三百篇不是民间的作品，不但雅、颂不是，连风诗也不是。一般论《诗》，从古代的经师直到近代的文学史专家都认为风诗是民间的著作，特别是那些谈情说爱的，一定是民间的作品。民间要谈情说爱，这是没有疑问的，但是这不是说士大夫，乃至封建主就不要谈情说爱了。照我的认识，民间的谈情说爱，还是有一定节制的，到了奴隶主或是向封建主过渡的奴隶主，那就没有限制了。晋惠公烝于贾君；文公纳怀嬴；宋公子鲍美而艳，襄夫人欲通之。这些奴隶主，什么事做不出来！我们有什么理由把谈情说爱的事都要由民间负责呢？何况这个民字，象征着一个带了镣索的人，他不知命在何时，当然既是有生命的动物，他不会没有传宗接代的潜意识，但说他的爱人是“将翱将翔，佩玉琼琚”，那真和晋惠帝的“何不食肉糜”，走上了同一条道路。

《中国文学批评论集》全是我在武大《文哲季刊》上发表的作品，多半平铺直叙，没有什么心得。《读诗四论》也是先在季刊上发表的，但是意境粗犷，这里正看到我既不是搞经学，也不是搞文学史的胚料。

由于开课的关系，我向几部史书发展了。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五〇这十年中，我陆续写了《史记考索》、《汉书考索》、《后汉书考索》三部书，其中《史记考索》在开明书店出版；《汉书考索》只完成了三篇；《后汉书考索》写成了，却没有出版。在这三部书之中，我比较偏爱《后汉书考索》，但是由于自己懒得向出版社交涉，没有出版。这个责任是我的，因为我总有些担心对于出版界最好不要过分主动，以免在受到阻挠的时候引起双方的隔阂。古人说过：“未同而言，观其色赧赧然。”这个赧赧然、实在不很受用。

在写《史记考索》的当中，我住在乐山半壁街一座小楼里，每天除了生活必须的一些活动以外，我始终是小楼坐起，足不出户，这才在崔适的《史记探源》以外，发现了更多的窜乱。崔适认为《史记》止于麟止，我认为《史记》止于太初的前一年，这些都应尽量做到言之有据。特别关于《史记》的互见之例，我看到《史记》常有在一个人的正面记载里只叙述他的好的或坏的一面，而在其他的记载里，却叙述他的另一面，因此只看《史记》的个别叙述，往往不能得到全面的印象。例如在《魏公子列传》里，我们看到他如何“仁而下士”，可是在《虞卿传》里，我们看到魏齐在大梁遭到迫害的时候，他去看信陵君，信陵君不见；可是他到邯郸去看虞卿，虞卿弃赵国相印，陪同这位避难的朋友，一同出走。那么信陵君的为人，不是没有缺点了。同样地，在《魏其武安侯列传》里，我们看到的田蚡是如何地骄横，可是《河渠书》记着在黄河决口，汉武帝大发吏人勉强塞口的时候，田蚡却说：“江河之决，皆天时，未易以人力为强塞，塞之未必应天。”他的言论，不是没有一定的道理。在黄河塞口的时候，不能及时疏导，只是一味地蛮干，必然会招致失败的结果。汉武的《瓠子歌》，虽然在文学史上不失为千古流传的名作，但是在水利史上，只是一次失败的纪录。《史记》是一部整个的著作，要通读全书，不能只就一两篇作品，就判断司马迁的主张。

《后汉书》又是一部特别的著作。在范曄作书的时候，关于后汉时代的撰述，完整存在的有好多种。范曄没有掌握到更多的史料，只能就诸家的撰录，钞撮成篇，有时还有钞错的，一事重出的。这些经过钩稽以后，明明摆在那里，但是范曄还是写出了他的著作，甚至自称“比方班氏所作，非但不愧之而已”。是什么思想在那里支持他呢？他提出了自己作书的宗旨，认为后汉的乱而不亡，皆出于仁人君子之力。他要求的是在国家危难之中，必须有李固，杜鹰，范滂，郭泰这样的人物，出而担当国家大事，才能维持一个乱而不亡的局面。他写的是后汉，但是他的心目中存在的是东晋。后汉时代，除了开国之初，光武、明、章之际，国有长君撑起一个统一的局面，以后大都是襁褓之君，母后当朝，外戚专权，宦官擅政。这就终于造成东汉末年的大乱，但是“乱而不亡”，从范曄的阶级眼光看来，主要还是依靠当时的仁人君子。东晋的情况，其实和东汉差不多，虽然国有长君，但是大半的君主都是头脑发育不全的白痴，国家的存在，主要还是依靠王、谢、温、庾这些世家大族。这便是东晋的仁人君子。以后刘裕出来，反王恭、反刘牢之，终于夺取东晋的政权。古代政权的攘夺，本来和老百姓的关系不大，只要剥削不太严重，人民概不过问。可是自从刘宋执政以后，就是一味的杀、杀、杀，杀了东晋末代皇帝以后，刘裕一死，几个儿子相互间又是杀、杀、杀，连带稍有关联略有声名的人也是杀。范曄也是在这个情况之下被杀的。我们必须看清当时的具体情况，才能理解范曄的《后汉书》。

但是我不是专在古书中钻研的。大约是一九三九年吧，一所内迁的大学的中文系在学年开始，出现了传记研究这一个课，其下注明本年开韩柳文。传记文学也好，韩柳文学也不妨，但是怎样会在传记研究这个总题下面开韩柳文呢！在当时的大学里，出现的怪事不少，可是这一项多少和我的兴趣有关。这就决定了我对于传记文学献身的意图。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有传记类，指出《晏子春秋》为传之祖，《孔

《子三朝记》为记之祖，这是三百年前的看法，现在用不上了。有人说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为传记之祖，这个也用不上。“史”、“汉”有互见法，对于一个人的评价，常常需要通读全书多卷，才能得其大略。可是在传记文学里，一个传主只有一本书，必须在这本书里把对他的评价全部交代，除此以外，没有回旋的余地。所以史传的价值虽大，但是对于近代的传记，在写作上是没有帮助的。

是不是古人所作的传、行状、神道碑这一类的作品对于近代传记文学的写作有什么帮助呢？也不尽然。古代文人的作品，主要是对于死者的歌颂，所以刘义认为韩愈的作品是谀墓文。当然，这一类的文章，可能也有微辞，但是到底是以谀墓为主，对于近代传记文学是没有什么用处的。唐以前这一类的作品篇幅还不太大，到宋代，如苏轼的《司马温公神道碑》，朱熹的《张公行状》，前一篇是万把字，后一篇是四五万字，气魄是越来越大，仅从这一点看，还是很不容易的。我对于黄干的那篇《朱子行状成告家庙文》，特别钦佩，觉得他那实事求是，一字不苟的精神是值得推崇的。不过这些作品，究竟不是传记文学。

除了史家和文人的作品以外，是不是还有值得提出的呢？有的，这便是所谓别传。别传的名称，可能不是作者的自称而是后人认为有别于正史，因此称为“别传”。有些简单一些，也可称为传、叙，如后汉的《钟离意别传》、《曹瞞传》、《马钧叙》之类。这类作品保存下来的不多，即是幸而保存下来，也大半是零落不全。可是写得都很生动，没有那些阿谀奉承之辞，而且是信笔直书，对于传主的错误和缺陷，都是全部奉陈，不落后代作家的窠臼。最可惜的是这些作品，不易掇拾，而且没有较完整的篇幅，也无法给我们以良好的范本。

是不是可以从国外吸收传记文学的写作方法呢？当然可以，而且有此必要。但是不能没有一个抉择。罗马时代的勃路塔克是最好的了，但是他的时代和我们相去太远，而且他的那部大作，把每个古希腊人物和古罗马人物同列一篇，相互比较，虽然确实可

以使人知人论世，产生一种絮长比短的认识；但是他所着重的是相互比较而很少对于传主的刻画，因此我们只能看到一个大概而看不到入情入理的细致的分析。

英国的《约翰逊博士传》是传记文学中的不朽名作，英国人把它推重到极高的地位。这部书的细致是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位，而且由于作者和传主长期地生活在一起，每晚常能把这一天的接触，警效言笑，全部记录下来。但是的确也难免有些琐碎，而且由于约翰逊并不是当时的政治中心，其人也并不能代表英国的一般人物，所以这部作品不是我们必须模仿的范本。

是不是本世纪初英国所开创的“近代传记文学”，我国已经翻译过来的《维多利亚女王传》可以作为范本呢？应当说是可以，由于作者着墨无多，处处显得颊上三毫的风神。可是中国文人相传的作法，正是走的一样的道路。我们不免产生“居简而行简，无乃太简乎”的感想。所以无论近代人把这部作品怎样推崇，总还不免令人有“穿新鞋走老路”的戒心。

对于国内、国外的作品读过一些，也读过法国评论家莫洛亚的“传记文学的几个面相”那本传记文学的理论，是不是对于传记文学就算有些认识呢？不算，在自己没有动手创作之前，就不能算是认识。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”，其实，乐之者还是不如作之者，在自己没有动手去做的时候，是谈不上真正的“知”，更谈不上“好”和“乐”。

这时是一九四〇年的左右，中国正在对于日本军国主义者艰苦抗战的当中，我只身独处，住在四川乐山的郊区，每周得进城到学校上课，生活也很艰苦。家乡已经陷落了，妻室儿女，一家八口，正在死亡线上挣扎。我决心把研读的各种传记，作为范本，自己也写出一本来。我写谁呢？我考虑了好久，最后决定写明代的张居正。第一，因为他能把一个充满内忧外患的国家拯救出来，为垂亡的明王朝延长了七十年的寿命。第二、因为他不顾个人的安危和世人的唾骂，终于完成历史付与他的使命。他不是

没有缺点的，但是无论他有多大的缺点，他是唯一的能够拯救那个时代的人物。

这部作品出版了，最初是由开明书店付印，解放以后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再版。一九六六年以后的十年动乱中，我受到那个时代的种种折磨，甚至出现了家破人亡的局面，说什么呢！但是却出现了一个相当意外的遭遇。我算是反动学术权威了，奇怪的是，正在不断批斗，下放劳动的当中，“四人帮”的二十六位大法家的名单发表了，张居正也是其中之一；在关于张居正的学习文件中，我的那本《张居正大传》却又名列前茅。事情真是愈出愈奇：韩非在那篇《说难》中曾经提到凶狠的统治者对于言论家的两套办法，或则是“阳收其身而实疏之”，或则是“阴用其言，显弃其身。”四人帮却发明了第三套，一面是尽量地摧残，一面却又显著地利用。他们的阴毒险狠，大大地超过了这位思想家韩非的想象！

在《张居正大传》完成的时候，我正在重庆的一所大学教书。我想到张居正的不辞艰苦，为国献身的精神，我更想到王守仁的扫除陈言，即知即行的努力，决心要写一本《王守仁大传》。但是在写作中遇到的艰苦比在乐山更加深刻了。乐山那座大学的书不多，但是借还可以借到；重庆的情况不同，沙坪坝是出名的水陆码头，既是码头，当然就有把头的作风。一位搞甲骨文的教授听到了丁山要来，知道丁山也是搞甲骨文的，他就把甲骨文的书籍全部借空，搞得丁山教授摇头叹气，一事无成。又一位教授把图书馆的书籍借满了三间大屋，恰巧我要读的关于王守仁的书籍都供养在那里。我向教授商恳转借。他很慷慨地同意了，但是说清只能以一个月为期，不能拖延。这已经是非常的慷慨了。我只有没晓没夜地提纲摘录，后来勉强写成《王守仁大传》，可是出版却成了问题。抗战后期开明书店的生产力衰退了，而那家蒸蒸日上的正中书店虽曾托人向我征求稿件，我因为没法摸清正中书局的政治立场，不便和他们接洽。以后这本书的稿件留在故乡。解放以

后，我们一家人都出来了，书籍手稿还在家乡，此后家中又来了许多不速之客。十年动乱当中，真是一场浩劫，人遭劫，房子遭劫，书籍遭劫，手稿遭劫。保全性命已经是侥幸，至于这部手稿的存在与否，我是管不到了。

解放以后，我在上海的一座大学教书，一直到大跃进的时期。大跃进中同学们提出不少的要求，要教师们在一年的业余时间里写出二十万、三十万乃至五十万字的著作。那时，我担任系主任，当然是义不容辞了。我除了教课和一切临时性工作以外，没晓没夜地写，终于写成了《陆游传》、《陆游研究》、《陆游选集》三部著作。陆游是大家熟悉的诗人，特别是他那部《放翁诗稿》，基本上是编年的，因此对于他的思想发展过程、创作道路，他一生的遭遇，和最后的严正立场都不难理解。比较困难的是他和王炎的关系；和他在王炎部下做了些什么事业，以及王炎这颗政治界的惑星，怎样突然暴发，照亮了西北的长空；以后又怎样消沉，以至在《宋史》里几乎没有留下丝毫的记载。这时恰好《宋会要辑稿》出版了，我从那部茫无涯际的著作中找到王炎的生平。我理解到宋孝宗给与王炎的使命。陆游正是为着完成使命而奔向南郑这个准备出兵收复失地的前线的。他的《秋波媚》这首词就说出当时的战略要求。但是临安还有那位侥幸成功的丞相虞允文呢。在允文的策动之下，南宋王朝的政策变了，从收复失地的雄心转变为和平共处的偷安。王炎撤回杭州，陆游也调到成都作一名闲散的参议官。他那首《清商怨》正叙述了他的苦闷心情。“梦破南楼，绿云堆一枕”，这样沉痛而又宛转的词句，在宋词中是少有的。捉摸到这一点，我写出了那三部作品。

那时我正在大学里开宋代文学史这一课，由于陆游对于梅尧臣的诗作了高度的评价，结合到刘克庄所称梅尧臣、陆游为宋诗之集大成者，这就使我感到有对梅尧臣再作深入探讨的必要。但是梅尧臣的那部《宛陵集》实在是非常的难读。全书六十卷，既不编年，又非分体，简直是一盘大杂烩。近代夏敬观曾经提出梅尧

臣的作品，可以根据年谱重行整理。这是一个极有价值的见解。但是敬观所说的元人张师曾编次的《宛陵都官公年谱》并不可靠。张谱记载明道二年尧臣除德兴县令，景祐元年在德兴，二年以德兴县令知建德县，而深讶尧臣在德兴县之无诗。其实《元史》说“尧臣以德兴县令知建德县”，是从欧阳修的《梅圣俞墓志铭》抄来的，宋人的所谓“以德兴县令知建德县”，德兴县令四个字只是一条空衔，尧臣始终没有到过德兴县去。既然没有去，当然不会有诗。张师曾不知道这个情况，慨叹尧臣在德兴的没有诗，实在有些浪费。夏敬观认为可以根据年谱进行编年，当然是一件不可能的事。这就成为他尽管有此愿望，始终无法完成的张本。我在一九六二年以后，开始编写《梅尧臣集编年校注》、《梅尧臣传》、《梅尧臣诗选》，一九六五年完成。在这三部书中，我对于《梅尧臣集编年校注》化费的时间较多。因此也比较重视，错误必然会有，但是为后来的研究者，多少铺平了一段路，我感到气力不会是浪费的。《梅传》指出尧臣和范仲淹的关系，由友好而转为敌视，以及他对于文彦博的攻击。有的同志觉得有些怀疑，其实人和人之间的友谊，要经过时间的考验，而史书上所称的名人，其中尽有许多不实不尽之处。踢开现象看本质，在讨论历史人物的时候，完全有此必要的。

梅书三种的完成，在文化动乱的前夕。在动乱中，这三部底稿都经过没收和检查。有的造反派认为必须烧去，但是也有人认为千万不能烧毁。在烧与不烧之间，争执了一段时间，最后总算侥幸，没有烧去。因此这三部书才能陆续出版。否则我自己认为不可能再有精力把这三部书重新整理出来。

在批斗、审查的间隙里，我并没有让时间白白地过去。我曾经把明末陈子龙的作品好好地研读过。我觉得清代陈皇士选《天启崇祯两朝遗诗》，录陈子龙诗一百多首，后来沈归愚作《明诗别裁》、《国朝诗别裁》，一首也没有录取。这说明了一个问题，在清朝前期，对于明末这些故国遗臣是讳莫如深的。我又读了陈

子龙的《安雅堂集》，更看到一六四四年他在南京担任兵科给事中的时候，对于当时的朝政知之甚深，言之甚切，不愧为一代的人才。我看到他的《皇朝经世文编》，更见到他熟于朝章国故，热心报国，确实为明末的第一流人物。他一再起义，终于失败而死。对于这样的一个人物，有为他写作传记，编订选集的必要。我愿意在我有生之年再为此作出一定的努力。

这不是我在那十年动乱中没有什么写作。现代写传记的人物多半是写的历史人物，因此有人把传记文学作为古代文学的一个部门，这实在是不妥的。古代人物要写。现代人物也要写，不能把写古代人物的作为古代文学来看待。那么为什么多半是写古代人物呢？这里有一个道理，古代人物所遗留的记载或著作不多，因此易于收拾；近代人物就不这样了，所遗留的记载或著作较多，不易收集，这还是次要的。古代人物的立身行事，众所共知，因此易于作出评价；近代人物就不然了，时代既近，你无法作出确切的估价。在峨眉山脚下，你无法估计峨眉山的全貌；可是到了乐山县，你就可以得出全面的认识了。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赞：“孔氏著《春秋》，隐、桓之间则章，至定、哀之际则微，为其切当世之文网而包（原作“而罔褒”，“罔”与“网”通，倒在“而”下，“褒”同“包”）忌讳之辞也。”司马迁是理解这类艰苦的。

当然，我不是没有为现代人写过传记。在动乱的当中，我曾经为一个受到冲击，含冤而死的妇女写过一本传。那时的写作是一件艰险的事情，我没有把这位妇女的自杀直接写出，我只写到在古漪园听到的歌曲：“大风溯洞倾天地，余波亦复到穷乡，摧残谁复知爱惜，别来但觉尘满床。玳簪珠珥久抛却，罗衫纨扇空满箱，呜呼岂知玉骨付飞焰，至今尘土有余香。”倘使读者能稍一回味，便理解到诗中的本事。古代的《西台恸哭记》、《冬青树引》，都是在同一心理状态下写出的。在这本传里不仅结局写得晦涩，甚至地名也在若明若昧之间。这里有崇川县、骥渚县、奉雉县、济川县，淮南东路、升州。只要稍一指点，事情都很明白。那你

问为什么这样写？你去问哈代，他在写《苔丝姑娘》时，为什么出现威撒克斯这个地名呢？好心的朋友曾经为我把这本书介绍给上海的一家出版社。编辑先生吩咐：“不能有虚构。”我说：“地名、人名，都是虚构的，不出版也好。”浩劫以后的编辑先生坐在保险箱里说话，心情是不一样的。

我的一生很简单，从读书到教书，从教书到写书。我的日常生活也很简单，从有家到无家，现在又从无家到一个七零八落的家。我的地位既简单，可能也有些不太简单，从学生到教师，再从教师到劳动改造，现在又从劳动改造回到教师。这里没有什么可夸耀的，更没有什么可惋惜的。

朱东润主要著作目录

读诗四论	商务印书馆
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	开明书店
中国文学批评史论集	开明书店
史记索引	开明书店
张居正大传	开明书店
陆游传	上海中华书局
陆游研究	上海中华书局
陆游选集	上海中华书局
梅尧臣传	北京中华书局
梅尧臣诗选	人民文学出版社
梅尧臣集编年校注	上海古籍出版社
左传选	上海中华书局
杜甫叙论	人民文学出版社